

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范式与当代价值

曹 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武汉

【摘要】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工业城市的崛起带来了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芝加哥学派凭借其独特的传播学和犯罪社会学理论成为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在传播学方面，芝加哥学派强调以社会互动为理解城市社会的基础，倡导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民主传播，鼓励直接观察和研究城市生活，展现出独特的实证研究方法。在犯罪学方面，芝加哥学派聚焦城市生态对犯罪控制的影响，提出的同心圆模型、社会解组与社会重构理论为理解犯罪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在当前城市化加速、社会问题日益纷杂的背景下，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与理论价值。

【关键词】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传播思想；犯罪社会学

【收稿日期】2025 年 2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86

Research paradigm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chicago school urban social problems

Jie C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Abstract】 The wa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opelled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ties engendered numerous complex social issues. The Chicago School emerged as a pivotal force in studying urban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its distinctive theorie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criminological sociology. By empirically analyzing pathological phenomena such as social anomie and deviance, it sought to foster positive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Chicago School emphasized social interaction as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urban society, positing that communic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human socialization and urban problem-solving. It advocated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ed direct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urban life, demonstrating a unique empirical methodology. In criminology, the School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urban ecology on crime control, offer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such as the concentric zone model and theories of social disorganiz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to interpret criminal phenomen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and increasingly intricate social challenges, the Chicago School'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 retain significan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relevance for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urban issues.

【Keywords】 Chicago School; Urban Society; Communication Ideology; Sociology of Crime

城市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展的关键社会背景。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播学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城市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芝加哥学派。彼时，美国的工业化迅猛发展，芝加哥面临着大规模移民聚集、城市环境恶化、社会贫富分化、多元文化激烈冲突、社会治安混乱等现象^[1]。就此，芝加哥学派致力于对社会失范、越轨、帮会、自杀、家庭解组等城市化进程中的病态社会现象展开经验研究，以期达到社会改造与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目的。该学派中，库利、杜威、米

德、布鲁默、戈夫曼主张人与社会的相互界定，从人与他人的互动中理解城市社会，成为传播学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另一批代表学者帕克、伯吉斯、肖、麦凯以芝加哥为试验田，开展以犯罪行为、社会越轨行为为焦点的犯罪社会学研究，探寻犯罪浪潮产生的社会原因。

芝加哥学派通过研究社会问题而开展社会改造，具有改良、进步以及实证价值。而如今城市化进程持续、媒介化社会发展、社会失范现象频发的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社会失范、社会结构失衡问题。本文即受芝加哥

学派的传播学和犯罪社会学之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启发,试图探讨当今中国城市改良的有效路径。

1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城市化进程必然引发人的变化,而城市必须解决人的适应性问题。在对社会的改良与应用中,传播的作用不容忽视,大众传播是一个民主社会面临诸多城市社会问题而得以延续的重要方法^[2]。具体而言,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其传播思想存在以下特点:

1.1 以社会互动为基石

齐美尔的思想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思想起源,他强调社会互动,认为社会源于人对另一个人直接或间接通过第三方媒介产生影响、相互作用。这一观念贯穿于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历程,库利、杜威、米德、帕克等人均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分析社会问题,将传播视为人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库利的“镜中自我”“初级群体”理论强调在与他人的联系中获得自我认识,成为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杜威提出社会在传递与传播中存在;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先验存在,揭示了人之社会化的符号本质,和人际、人内传播过程之本质^[2];帕克则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角度探究人之社会化的传播形态^[3]。

可以说,芝加哥学派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其直接目的并非传播研究。他们将传播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深入挖掘人、传播媒介及城市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一观念也为后续传播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滋养,也启发传播学者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研究。

1.2 提供新研究方法

为解决转型时期美国城市社会的诸多难题,“有用即真理”哲学精神受到重视。杜威是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美国的发展和保存者,在参与各种社会改良运动中不断发展该思想;^[3]米德从对芝加哥城市形态的直接微观观察中总结出符号互动理论;帕克将城市作为研究人的传播行为和社会互动的天然试验场,鼓励学生前往街道、田间,通过观察、交流等获得深度理解^[2]。这一研究范式在之后的传播学研究中被广为沿用,在犯罪社会学领域也得以彰显。

1.3 具有人文主义取向

面对当时美国社会强劲的精英政治思潮,芝加哥学派将由公众参与的传播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环节,鼓励公众全程参与新闻生产,参与政治,发挥自身潜力。杜威肯定新闻承担的民主角色,要求恢复公众权利,公众于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主张自己的合法利益,也聆听、

服从公众的利益,从而厘清社会的价值目标^[4]。由此,传播起到了连接公众,以及解决个人与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简言之,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公众参与。

此外,芝加哥学派广泛考察社会中的人与社会组织,关注城市中的移民、少数族群、黑帮、舞女等边缘群体,试图改良其生活境遇。这都展现出芝加哥学派的人文主义色彩。

1.4 关注亚文化群体

“亚文化”一词诞生于1947年,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就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重点关注下层和边缘群体、越轨青年的种族聚集、帮伙林立、犯罪及自杀等生活状况。如前所述,帕克利用生态学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时,提出城市化引发了社会解体,社会解体进一步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催生了亚文化。贝克尔受米德符号互动论的影响,通过标签理论解释亚文化群体的先在逻辑,使得社会控制与越轨行为密切相关:越轨行为之所以越轨,在于社会中其他人的定义。而一旦被标签的越轨人群被污名化,就只能以该身份回应社会。部分被标签的越轨人群逐渐接受或者相信标签,最终只能加入亚文化群体寻求支持。在芝加哥学派的眼中,传播即促进社会变迁和进步的有利因素,报刊等媒介可以帮助亚文化群体融入社会,从而推进现代民主共同体社会的发展。芝加哥学派对亚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开启了学界关于亚文化论的研究潮流^[5]。

总之,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思辨性、经验性及人文性。且传播学是一门涉及文化、社会、心理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尤其与社会学关系紧密。芝加哥学派的独特视角也在犯罪社会学领域加以体现。

2 芝加哥学派的犯罪社会学研究

20世纪初,芝加哥被称作“犯罪之都”,城市转型滋生出大量犯罪现象。通过实证研究,芝加哥学派发现,犯罪现象与城市的空间布局、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由此发展出犯罪生态学这一标志性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来自两对学者组合:帕克与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理论,以及肖与麦凯的社会解组与社区重构理论^[1]。

2.1 同心圆模型理论

帕克是犯罪生态学的创建人之一。他运用生态学中动植物共生共存的原理分析城市生活,发现以特定类型为界的生活区之间都存在共生关系,既包括合作

和共存,又包括竞争和控制^[6]。生活区域的差异会影响本地区居民及外来人员的行为,而不同区域内产生的犯罪行为能够作类型化研究。

伯吉斯继承了帕克的社会生态有机体模型,并引入犯罪空间的概念,提出城市同心圆理论,将芝加哥分为内外五大区域(见图1):(1)中心商业区,包括商业设施,政府机构,餐饮机构等,居住人口少;(2)过渡区,指城市中最古老的区域,存有小型企业和工厂仓库,聚集了大量黑人、移民、流浪汉,是贫困人口集中居住区;(3)工人住宅区,环境较过渡区更好,住房相对简陋,以连排别墅居多,面积相对较小;(4)中产阶级居住区,房屋以独栋别墅居多;(5)郊区或通勤区,这属于城市最外圈,坐着上层社会的豪华别墅,多数居民于中心区工作,通过汽车往返于两地,但也有部分农民居住于此。各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以同心圆之方式发展,各区之间的半径差约2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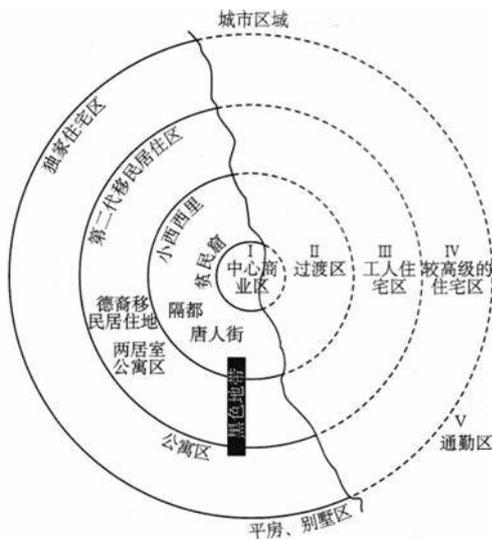


图1 同心圆模型

帕克与伯吉斯研究发现,过渡区的犯罪率极高。他们认为,高密度人口的频繁流动引发社会结构剧烈变动,致使原先社区的正常工作机制被破坏。原有主流文化价值观与外来文化价值观争夺主导权,引发文化冲突。而不同族群对本就贫乏的生存资源展开争夺,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冲突。该社区的凝聚力急剧减弱,从而完全失去对越贵行为的限制力,这也就是“社会解组”现象^[1]。

2.2 社会解组与社区重构理论

肖和麦凯采用来自警察局和法院的数据,对芝加哥不同地区青少年犯罪率进行统计分析,并通过绘图的方式予以可视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大量青少年展

开深度访谈,了解其社会与家庭状况、教育经历等。由此,得出以下结论:(1)中心区与过渡区的青少年犯罪率最高,这些地区也同样面临着最严重的其他社会问题,如赤贫、结核病盛行、婴儿早夭、危房等;(2)犯罪率形态不会受特定民族或种族群体影响,在新迁入族群的前提下,原社区的犯罪率保持在稳定水平;(3)青少年罪犯与其他普通青少年的智力、生理、人格等方面无明显差异^[1]。

肖和麦凯通过社会解组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认为成年人犯罪问题和青少年犯罪问题都是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解决犯罪率激增的困境,就必须对城市社会生态进行大规模改造,对社区的传统组织进行重组,由此诞生了“芝加哥区域计划”。

总之,芝加哥学派的犯罪社会学研究凸显了犯罪行为和城市社会生态之间的联系,也为主张罪犯选择作案目标主要取决于犯罪机会的机会理论、主张罪犯的日常生活模式必然对犯罪地点之选择产生影响的日常行为理论奠定基础。生态犯罪学注重环境对于犯罪行为的作用,相对于犯罪心理学而言,它更易应用于犯罪控制领域。肖和麦凯绘制的犯罪地图,至今仍是适用最广泛的犯罪控制手段之一^[7]。

3 芝加哥学派对当代城市社会的启示

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与20世纪的美城市芝加哥存在共性。芝加哥学派提出的上述理论观点,对于如今解决城市社会问题仍具有较大的当代价值。

3.1 强化文化城市建设

新芝加哥学派发展了原有的传播思想,提出场景理论,主张不同场景会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模式、消费行为及政治活动等造成影响,进而对整个城市的发展造成影响。其中,必须注重文化这一发展性手段、福利性措施及传导性举措与城市更新的关系,通过传播优秀的城市文化,增强市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城市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市民感知到场景中文化的适宜性与人文属性,从而引导民众行为,推动城市发展^[8]。

3.2 加强城市传播研究

除普遍认同的关注城市形象传播、关注城市媒体发展、关注媒介作品中的城市意象外,还需要深度理解芝加哥学派将传播媒介与城市社会相融合,在个人、媒介与社会中寻求联结的思想内涵。

具体而言,第一,现代城市汇集了最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交往手段,但陌生人社区问题大量存在。如何在城市社区中构建信任感,重建联系,增强交往密度,是现

代传播学应当思考的难题。

第二，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民工、打工仔、随迁老人等就构成了城市的特殊群体，既身处城市，又游离于城市之外。在这一特殊群体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传播媒介如何发挥积极作用，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也值得深思。

第三，芝加哥学派兴起的初衷，即在于解决城市社会的治理难题，保障民主社会的运行。如今，新媒介的兴起虽对民众起到了传播赋权的作用，但技术的联结还远未达到真正有效沟通的程度。从传播的角度充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及表达权，促进民众协商民主，构建畅通的诉求表达与权益保障机制，对于城市社会建设具有现实意义^[9]。

第四，传播灰色地带和信息洼地依旧存在。城市空间内部，也普遍存在传播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如媒体对弱势群体居住区的抵达性极差，市民通常对自我生存地区三公里以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等。传播对个人社会化的效果并未惠及全部个体的现状亟待改变^[10]。

3.3 关注亚文化群体

毫无疑问，中国城市中存在具有鲜明个性的亚文化群体，多由农民工、乡镇青年等边缘人群体组成。针对亚文化群体，首先，我们理应关注这类群体的生存状态，关心其情感和利益需求，尊重多元化文化的共生共存。传播媒介也可以打造良好的舆论生态，促使亚文化群体在城市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寻求共同信仰与群体意识，获得身份认同感^[5]。

其次，如今的亚文化已不再是最初单一社会结构下的理念，而是逐渐被全球化、消费社会及新媒体等多重因素重塑。网络新媒体的全覆盖性、高效便捷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催生了新的亚文化类型。原有小众化的亚文化向大众化转型，也能更多吸纳社会各阶层人群加入，形成一起分享、共同传播的良性循环，国际青年旅社就是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范例。

再次，无论从传播学角度，还是从犯罪社会学角度，都应尽量减少“标签化”的刻板印象。正如托马斯所言，社会中的个人必然与社会环境相联系，个人一旦被情境限定，不仅能定义情境的客观特征，还会针对情境的意义作出相应理解。而情境的意义一旦确定，个人的行为也会随之确定，成为必然。萨瑟兰的标签理论也赞同这一观点。但奉行人文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在对底层民众、犯罪分子这些被标定的群体展开深入研究后发现，严刑峻罚在犯罪控制上并未发挥出理想效果^[11]。相反，

破除偏见与刻板认知，为罪犯创造出相对宽泛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氛围，更有助于犯罪现象治理。尤其针对初犯、社会危害性较轻的青少年罪犯，只要我们能够给予重返正常生活的机会，他们就很可能顺利走上社会化的正常道路，避免累犯、惯犯、常习犯等恶性循环。这也正是当今刑法学界学者大量倡导轻罪时代刑罚轻缓化、前科消灭、犯罪附随后果轻缓化的重要原因。

3.4 减少机会犯罪空间

犯罪生态学有三大基本元素：犯罪人、被害人（被害目标）、地点（空间），三个元素共同组成了犯罪现象三角关系（见图2），三角关系的外层有包含监护（监管）人、看管人、经理人三个要素。该关系为犯罪预防提供了通用模式：落实相关人员的监护、看管、经营责任，减少犯罪机会，增大犯罪风险^[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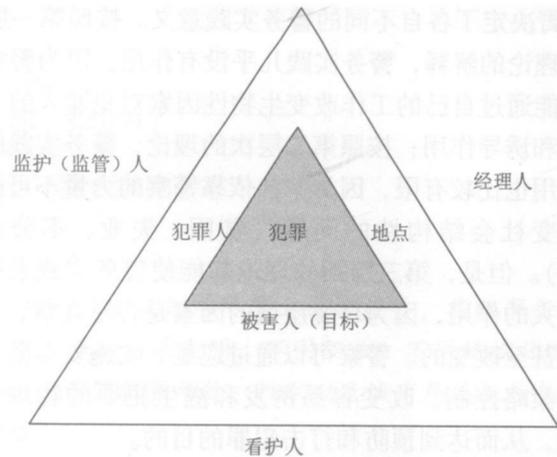


图2 犯罪现象三角关系

该模式被广泛运用于城市规划设计中，理性布局公共交通路线、住宅区、商业区和休闲区，都能够有效预防犯罪。

例如，香港地铁的设计人员广泛运用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减少地铁车间能够让犯罪分子藏身的死角，于可能的死角大量安装监控设备与镜子。相较于同样人口密度大、商业发达的纽约和伦敦，香港的低犯罪率必然与其城市规划相关。

3.5 设计防御空间

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人口聚集，住房需求大，高楼大厦同质化严重，不仅丧失了防御空间效果，还减弱了周边监控的覆盖效果。根据防御空间理论，增强个性化空间的个体归属感，强化路面照明、居民与行人对特定区域的无意识监管等自然监控，以及智能识别、天网工程等被动监控，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机会，从而控制犯罪。

3.6 改革警务实践, 应用犯罪地理画像

犯罪原因中, 环境因素最易观察、控制、改变。警察应预先处置犯罪信号, 对于酗酒闹事、毁坏公众财物等明显社会失序状况迅速作出反应, 减低潜在社会危害性。同时, 建立合理的巡逻制度, 确保充足且适宜的显性警务。犯罪生态学指导下以情报信息为主导的警务模式, 在英美国家盛行, 能在较短时间内减少谋杀案、纵火案、入室盗窃案、抢劫案等发案率, 实践效果显著, 改变了以往认定警察无法在根本上减少犯罪的错误认知, 值得我国的警务实践学习借鉴。

芝加哥学派绘制的犯罪地理画像也不失为侦查的有力手段。画像和计算机统计分析技术能够提供罪犯可能生活或活动的地理区域, 对罪犯的藏匿场所进行评估, 进而提高工作效率。直观了解城市内案件发生状况的空间分布状态后, 也能对犯罪高发区域采取针对性的预防与应对措施。

4 结语

中国的城市社会实际面临着上述相似的问题。同时, 刑法的轻罪化、轻刑化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公民被标定为罪犯。如何促使这些人群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一背景下,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范式能为我们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及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 极大提升我们对边缘群体和底层群众利益诉求的关注度, 进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出犯罪控制的有效方案, 以期构建一个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王良顺、郭泽强、周凌:《全球视野下的犯罪学原理》, 法律出版社 2022 年版。
- [2] 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殷晓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年版。

- [3] 宫承波、管璘:《传播学史》,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4 年版。
- [4] 孔洪刚:《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特点与渊源》, 载《当代传播》2011 年第 5 期。
- [5] 尹金凤、蒋书慧:《社会控制与文化同化:芝加哥学派亚文化研究的理论遗产及其当代价值》, 载《学术研究》2020 年第 8 期。
- [6] 梅建明:《论环境犯罪学的起源、发展与贡献》,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
- [7] 张远煌:《犯罪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 [8] 吴军:《场景理论:利用文化因素推动城市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载《湖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 [9] 张丽平:《论社会向度的城市传播研究——基于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 [10] 姜飞、黄廓:《“传播灰色地带”与传播研究人文思考路径的探寻》, 载《南京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 [11] 李习凡、何雨:《基于情境范式的芝加哥学派犯罪社会学研究》, 载《南京社会科学》2011 年第 7 期。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